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七五期 ——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12c)

---

【抗拒遗忘】	鲜血使人猛醒——谭合成著《血的神话》序	杨继绳
【书刊评论】	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血的神话》序二	丁 东
【春秋史笔】	《血的神话》后记	谭合成
【恐怖岁月】	“文革”中的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史海钩沉】	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	毛德传
【人物追踪】	揭秘 1977 年为“四人帮”自杀的北京市公安局长	蔡明忠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抗拒遗忘】

鲜血使人猛醒

• 杨继绳 •

——谭合成著《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序

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化大革命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

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附带说明一点，目前流传于海内外的关于这场大屠杀的资料大部分源自于谭的调查与采访，但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和更多的东西还在本书之中。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将道县大屠杀的杀人手段归为十类：1.枪杀；2.刀杀；3.沉水；4.炸死；5.丢岩洞；6.活埋；7.棍棒打死；8.绳勒；9.火烧；10.其它。仅这些抽象的名词便足够叫人心惊胆战，而其间对人类良知和精神的杀戮更在其上。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

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他们还处于恐惧、贫困之中。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

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

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受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形成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

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和谐。

鲜血不会创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一定会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

## 【书刊评论】

### 又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血的神话》序二

· 丁 东 ·

谭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1997年。我和陈敏之先生应黄德志女士之邀，编辑了《顾准日记》一书，但出版受阻。当时担任《书屋》主编的周实，介绍我认识了运作过《中国左祸》一书的谭合成。谭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说通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并自己承担投资风险，迅速推出此书，知识界争相传阅，堪称一时盛举。

谭先生学工出身，却酷爱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就名动三湘。当时，中共高层老人重掌国柄不久，在各级政权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还未达到，余悸犹在，所以强调彻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学界看准了文革题材的轰动效应，所以也十分热心组织和投入这方面的创作。作为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谭先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采访良机，以官方身份深入道县，全方位采访1967年发生的大规模杀人惨案。谭先生采访时，道县惨案善后工作尚未结束。这使他不但可以查阅全部原始档案，而且可以采访大量当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包括在押的行凶者。以后二十多年间，他又几赴道县，补充调查，全方位、多层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这本题为《血的神话》的大作，长达五十万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有各方面数据的详实统计和分析，有对大量个案的生动描述，如实地记录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可以说，为这起不能掩盖也不应遗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触目惊心的墓碑。

道县事件发生于文革期间。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县全部10个区，37个公社，都出现了滥杀无辜的暴行，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占全县总人口1.17%。受道县影响，杀人风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区其余九县市，全地区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经久不散。

读完这部大著，掩卷长思。我不能不思考，这种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文革前期担任47军军长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黎原将军，当时曾和华国锋等人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杀人风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起因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将县武装部的武器抢劫一空，并在县城打死工人、农民各一人。引起各地农民群众纷纷组织‘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展开大规模的杀地主及其子女的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也起而报复，一时间，双方互相残杀，越杀越眼红，并波及到江华、江永等县。”但是，谭合成却告诉我们，1984年，处理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就调查清楚：“被杀的9000多人中，无一人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动，无一人有过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于辩白，

说自己无罪。”“这段时期，道县破获的七大‘反革命组织’经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说，所谓敌情根本不存在。而杀人过程中也不是两派互相残杀，而是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杀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也没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贱民。黎原写回忆录时早已不在湖南工作，凭借的还是1967年的印象。而谭合成的答案，则建立在反复调查和比较鉴别的基础之上。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野蛮征服曾经一再发生。杀戮男性，占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惯用方式。类似的血腥的屠杀，也曾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县事件，虽然在行为方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主导性的理念不是对异族的征服，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以阶级斗争名义进行的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演变为治国之道。他把人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富农和贫农、雇农，剥夺资本家、地主、富农的财产，甚至消灭其肉体。中国共产党是列宁在中国扶植的秘密政治团体，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和发挥。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剥夺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内容。抗日战争时期，因为国共合作，一度改行减租减息的温和政策。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从解放区到全国，再度开展土改运动。其间打死、逼死的地主富农难以数计，仅1947年几个月内，在北方的几个解放区就死了25万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经试图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批评。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执政党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当时的杀人风，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不同点仅仅在于决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级干部，而是出自县、区、乡、村几级基层政权。掌握县级领导权的是人武部，实施者是人武部、“红联”和区、社、大队三级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当时介入杀人的国家干部有426人，占全县干部总数的22.6%，农村基层干部有4665人，占全县基层干部的66.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参与或支持过杀人的地方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数年以后，又重新入党，官复原职，有的还得到提拔和重用。他们本来就是执政党的自己人。

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县在文革中首创。毛泽东称赞“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就掌握过生杀大权。1947年，领导解放区土改的刘少奇曾经主张，组织起人民法庭，由政府 and 农会各派法官，土改期间每村都搞一个，给他们杀人权。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毛泽东也曾经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权从省下放到专区。并提出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五，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可超过千分之一点五。那场运动实际杀人为七十一万二千人，占当时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最高领导人预先确定杀人的百分比，已经埋下了大规模错杀无辜的隐患。当今世界，许多文明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国家执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国大陆近年将死刑的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说，这是靠近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谭著告诉我们：如果基层官员握有生杀大权，且无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后果是多么可怕！

道县惨案，放在人权意识有所觉醒的今天，可谓骇人听闻。但对于这种暴行的反思和检讨，在中国大陆仍然困难重重。历史的伤疤仍然被权力有意地粉饰。在全球范围内，希特勒等种族主义狂人的大屠杀受到了文明人类的一致谴责，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阶级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杀戮，只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反思和清理。最近，对红色高棉前领导人的审判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政治运动，上自建国初的土改、镇反，下至1977年对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史云峰等一批政治犯判处死刑，许多历史上的暴

行尚未得到清理。谭合成先生正是清理历史的先行者之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遮蔽国耻，四维不张。中国应当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承担起清理历史的使命。让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建立在人性尊严的基石之上。

□ 原载《共识网》

~~~~~

# 【春秋史笔】

## 《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后记

• 谭合成 •

要写的东西还很多。

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

但是，真正完成这篇历史纪实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和全民族的努力。笔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一架照相机和一支录音笔而已。

切勿以为我的这篇历史纪实只是一个遥远的血的神话；切勿以为大屠杀的阴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不再回来；记得某人说过：“世界上哪怕最荒唐的一个理论，在中国走上一圈，都能找到上千万的信徒。”虽有危言耸听之嫌，但也确实惊心动魄。

我在这篇纪实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样的意思，我们反思道县文革大屠杀，更多地是为了生者，为了子孙后代和民族的未来。我们老了，无所谓，而我们的子孙还要繁衍生存，我们的民族还要发展壮大。新的问题、新的矛盾还会层出不穷，我们虽然无能预知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但应当知道哪些办法绝对不能使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重蹈覆辙、重复灾难的例证实在太多了！哪一次没有付出沉重的代价？哪一次深受其害的不是下层人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县大屠杀也是一份宝贵的民族遗产。关键在我们怎么对待它！拒绝承认和反思历史的社会，是无法建设起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感的，自然也难以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一个民族在被迫面对其历史上“最黑暗篇章”的时候，最能检验这个民族真正的力量。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所谓“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须知那背后全部都是人命和鲜血！真的一点都不可笑。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三十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这篇历史纪实中记录的杀人理由讲给他们听，甚至可能被斥为“造谣”，笔者就亲身碰到过这种事情。须知这些理由在当年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经绰绰有余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送卫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认真地治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痛，认真地检视一下残杀的真正原因，又一窝蜂地挤上了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一千二净。三十年前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得足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创伤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

的最好机会。

道县大屠杀期间，县委某些领导人说：“道县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补课。”窃以为，中华民族历史是悠久的，但缺乏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人权匍匐在金钱下，金钱匍匐在权力下，（所谓穷不和富斗，富和官斗。）再不补课为时恐晚。

我在本纪实初稿时，曾写过一个类似后记的东西，此次补充修改时原拟删掉，因为那不过是笔者就事论事的一点肤浅的思考罢了，其中充溢了过多的激愤和不平，这不应当是一个历史记录者应持的态度。但一位看过初稿同时也看过本稿的朋友说：“道县大屠杀的杀人事件是历史，你们对这场大屠杀的采访也进入了这个历史之中，甚至成了这个历史的一部分，既然是历史，就应当尊重历史的原貌。”思之，以为然。故将这部分依然保留下来：

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伤口在艰难而缓慢地愈合着。此次处遗工作历时两年，一千三百余名干部在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整个处遗工作分四步进行：第一步，开展宣传教育，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法制教育，让党的处遗政策与群众见面。第二步，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此项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时，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401个专案，进行重点审查。第三步，安置被害者遗属，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遗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补偿金；第四步，对杀人责任人进行处理（全部都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一、对近二千名杀人事件策划者和杀人凶手做了开除党籍、免登、撤销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道县一千多名）；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判有期徒刑；三、对那些谋财害命、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情节特别恶劣的，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成批组织杀人者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仍然有许多遗属不服，仍在上告。他们被侮辱被折磨，他们的亲人惨死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中，他们自己的人格遭到最彻底地践踏，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1967年8、9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毁灭了。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和一纸“平反通知书”是无法抚平滴血的伤口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不公开的，象征性的处理是很难以拨乱反正的。那些杀人事件的策划者、制造者和实施者，至今没有谁公开地、发自内心地认罪、忏悔，更说不到向被害者道歉或为无辜惨死者的坟头添一g黄土。（绝大多数的被害者至今尸骨未收。）

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凶手，发生这场野蛮屠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受害者有权追究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是这样，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类似的甚至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当政者也有责任对这场屠杀向社会向人民解释清楚，因为他们对民族负有更大地责任。

在这场打着西方马列主义旗号，行东方封建专制之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字眼就像上帝一样神圣，作为一个阶级被抽象化和神圣化，赋予了“领导一切”的权力，实际上，每个具体的贫下中农的实质性的权利和利益又在哪里呢？他们与那些“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阶级敌人”一样，除了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之外，一无所有。毫无地位，毫无希望，任人摆布，劳累困苦，每况愈下……唯一可以做的即是充当专制制度的利刃，管制和虐杀那些比他们更可怜的同胞，来满足名誉上高人一等的虚荣。一位道县被害者遗属说得好：“可怜啊，他们就是一些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奴隶，管着我们这些连一条裤子都没有得穿的奴隶。”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则是建立在国民的奴性人格之上。这种奴性人格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生长于专制制度的土壤中，为专制者所培植，亦为专制者所利用。

应当承认，杀人事件的责任人大多数都是贫下中农或出身贫下中农，他们与被杀者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仇恨，然而谁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谁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

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是谁灌输给他们那么多“你死我活”的理论？

这些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其实，我们一脚踏上这块血染的土地，便感到自己像贫血一样苍白无力。我们是在试图做一件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除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别无选择。这是一块见不得人的伤疤，是某些人的一块心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耻辱！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个黑洞，把靠近它的一切统统地吸进，不论鲜血，不论热泪，甚至不论阳光。不怕你有多么勇敢，也不在于你是多么懦弱，靠近了，就吸进去，吸进去就永远永远出不来……哪一天才能客观公正地将道县大屠杀的真正元凶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还数千无辜惨遭屠杀的平民一个公道，给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永久的安慰；也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个明确的交代。

这一天，还需要我们等待多长的时间？

我在这段后记中，引用艾青的两句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而且我也确实流下了滚滚的热泪。

本历史纪实1986年11月完成初稿。1989年完成二稿。二稿完成之后，被长期束之高阁，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本人应当反省的问题。人在很多时候，其实很无奈，其实很可怜。但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的关注和补充调查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它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与我血肉相连了。上天用它莫测高深之手把我安排成了一个窥视全过程的目击证人。同样，不是我选择地它，而是它选择地我。

公元2007年8月，道县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在众多朋友的帮助、支持和关心之下，我终于补充、核对、完善了本历史纪实，是为第三稿。

然而还有些话想说。

二稿完成后的这些年来，我思考的东西转向民族性、民族魂和民族复兴这些方面，不再囿于杀人事件的是非罪过、因果报应，只有这样我才感到能够从覆盖我的血瘀中，钻出来，喘一口气。

有朋友笑话我“居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多是政治动物；北京市贫民窟里的老头、老太太，就着大白菜喝着大碴子粥，谈论的都是政治局开会研究的问题，我辈又何能免俗呢？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是有重大性格缺憾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亦有自己的性格缺憾，但相对而言，我们民族的缺憾要更致命一些。对于这些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酱缸文化培育出来的民族劣根性，已述颇多，如一盘散沙、奴性、爱说假话，窝里斗，窝里横等等，窃以为归根结蒂一句话，重利轻义，缺乏追求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勇气。这使得我们的民族经常重复过去的错误，而且很难难以纠正。我们反复在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然而，我们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我们在历史中什么也没学到。

中国历史，特别是现代史，充满了假历史，假事件，假典型，假榜样，只有把这些东西统统送进历史的垃圾箱，我们的民族还有真正的未来。



我们的民族魂多被解释为一往无前、百折不回、坚忍不拔、多难兴邦的伟大精神。这无疑是对的。问题是这种精神不能悬在半空中，它需要也必须有薪火相传的载体，这种载体只能也必须是一大批“铁肩担道义”的人文知识分子，而这些人文学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则是一批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深邃而伟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批御用的理论家。上个世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逝世时，在送葬的队伍里，有人打出了“民族魂”的祭幡，祭奠的既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同时也是他这个人。一个民族，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无论人口多么众多，甚至无论经济多么发达，如果缺少伟大的思想家，都是比较渺小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人畏惧思想甚于世上万物——甚至死亡。”思想具有颠覆性、革命性和破坏性，令人畏惧；思想对特权、陈规陋习毫不留情；……思想探视苦难之深渊，无所畏惧……思想是伟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光芒，人类的首要荣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人类的思想史。

倘若人来从来不会思想，我们至今还会在茹毛饮血的状态下，依靠杀戮和死亡的淘汰而挣扎于残酷的进化之中。一个民族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无疑是自取灭亡；然而如果着力于把读书人都培养成鹦鹉学舌的应声虫，那就是在阉割自己的灵魂。

世有千年粮，人无百岁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就像养猪一样，饲料搭配不当，囚坏了胚子，思想能力遭到重大削弱，但，思想的精神不能放弃，不论怎么说，都要把思想的火炬举起来，交到下一代的手里。我相信他们之中，一定会有伟大的思想家出现，因为时代在呼唤，家国在呼唤，民族在呼唤。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向现代化猛进，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世所瞩目。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口号被作为一种笑话在谈论。然而今天看来，这个口号好像并不是什么毫无根据的空话。但民族复兴的最终目标并非纯粹为了追求物质的富有，而是要让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个人尊严和自身价值的实现。伟大的复兴必须包括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精神文化，二是经济社会。仅有经济的发展，而无精神文化的复兴，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的民族，而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我们碰到一个富有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会很尊敬他；我们碰到一个有权的人，可以很羡慕他，不一定会很尊敬他；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一旦丧失了财富和权力，会堕落成什么样子。然而我们碰到一个一身正气、品德高尚的人，可以不羡慕他，但绝对不会不尊敬他，甚至仰视他。一个独脚巨人能够承受起越来越庞大体重的压力吗？能够承受起历史巨浪的不断冲击吗？企图用牺牲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大发展，掩盖制度的困境，最终只能缘木求鱼。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重铸伟大的民族魂。有了真正的民族魂才能保证经历风雨，愈挫愈勇，多难兴邦！

停下笔来，我不像当年二稿完成时那样激愤和心旌动摇，反而感到平静和如释重负。当年“告状油子”李念德在蛇坝桥上，与徐老师一席长谈，顿悟到道县大屠杀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事件，个人冤屈的伸张必须要靠整个历史事件的平反。而我也早已在对道县大屠杀的几次补充采访中悟到，道县大屠杀其根深植于民族的劣根性中，若要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审判和全民族的痛切反思，须待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历史的顿悟。

留下这些文字，为的是后人不会受到历史的欺骗。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类生活更具欺骗性，更变幻莫测。

窗外此时夜已渐深，宁静、美好，灯火璀璨，赋诗一首以抒胸臆。

当所有的苦难和渴望

如流星雨飞逝  
当无数的血与泪  
凝固成赤地千里的戈壁  
我的心中只剩下了爱  
我爱婴儿响亮的哭啼  
和母亲甘甜的乳汁  
我爱同桌的女同学  
和美丽的女教师  
我爱朋友们一起的欢聚  
和欢聚后微醺的醉意  
我爱孩子天真的笑容  
和老人们爱打的麻将  
我爱清晨新鲜的空气  
和星汉灿烂的夜幕  
我爱这块叫做中国的土地  
和这土地上所有的兄弟姐妹

今夜我又回归于婴儿  
依偎在母亲的怀抱  
不要说话竖起耳朵聆听  
那激情的歌如曾经的青春在唱  
不要声张把心底的秘密  
向亲爱的妈妈倾诉  
这辈子下辈子都不敢忘记  
的妈妈呀  
天高地厚无以为报  
只能像低头认罪那样  
把头低下再低下  
感谢你遗传给我的忠贞良知和爱  
尽管我是一个没有军装的战士

2007年8月

~~~~~  
【恐怖岁月】

“文革”中的邵阳大屠杀

• 何莲清 •

1968年，我10岁。“停课闹革命”，孩子们无书可读，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一天，邵阳市大街上有一张传单赫然入目：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列举了发生在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称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21种人及其家属定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以至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长满了蛆虫。传单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看到如此惨状，经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

都是无辜者，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去道县出差，所见所闻正如传单所言，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我们邵阳这边来，如果外地有可靠的亲戚，还是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客人走后却不敢问父亲。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确如父亲的朋友所预言，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飘到邵阳。邵阳县决定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 21 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并屠杀。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 20 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最后几位街坊收了尸，没钱买棺木，拿一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外出做工，侥幸躲过，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变得痴痴傻傻，半年不到就死去。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来抓人的农民不认识她，故无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某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她本人则被农民抓住将腿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获悉后，派人将其抬送到医院。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老家几十位农民来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马上带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到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狽逃窜，刘司机得以保住一条命。

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老家的农民无法进入单位找人，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我家的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刘司机事件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避难，直到半年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亲友。

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一大麻烦，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中，每天都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每天河岸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 10 元人民币作为打捞的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绝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资 36 元，集体企业只有 34 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 20 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 5 元，所以这 10 元打捞费还是比较诱人的。

当时资江正当汛期，河面浊浪滔滔，一些农民站在河岸打捞，有的将船驶至河心打捞。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的捞尸费，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我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打捞尸体，留下的恐怖印象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千奇百怪，有的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有的捆成四足攢蹄，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有的面部血肉模糊，难于辨认。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串起五个死者的两耳，两女三男，一个老年妇女，一个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个 30 多岁的妇女与一个 10

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的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这两串尸体被捞上岸时，不少围观者为之落泪。我看了之后一连几天做恶梦，吃不下饭，再也不敢去看捞尸。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有口水井，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那井本来水很旺，每天都被提得见底，过一晚才又蓄满。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不得不趁天未亮时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至卫生标准，前来我家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见证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邵阳县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全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黑杀队员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如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呈圆锥状）烧红，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铁板烧”酷刑所致。不少女人死前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象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和猪等。到后来，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

□ 原载《明镜历史网》  
~~~~~

【史海钩沉】  
  
公安系统的文革浩劫

• 毛德传 •

世界上任何国家皆建置有公安（国家安全）机关，以保障社会稳定国家安宁，保护广大民众及经济文化发展。而在由共产党执政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重视尤甚。统驭过该国情治特工内务，而后任该国一、二把手者不少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苏联的安德罗波夫、东德的昂纳克在担任党第一书记前，都曾领导过全国特勤机关秘密警察。俄罗斯普京本是克格勃头子。古巴党原由菲德尔·卡斯特罗之弟劳尔·卡斯特罗主持情特。今菲德尔久病，而卡家有劳尔紧握古巴最高权力，尽可安稳睡觉医病，不担心哈瓦那有“斧声烛影”、“玄武门之变”。蒋介石大陆失败退保台湾初，就派其子蒋经国监督所有情特部门，为小蒋掌权接班底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统区由周恩来领导锄奸情特隐蔽战线。抗日战起，在长

江局、在南方局，也由周公亲自抓。解放区各级设社会部锄奸部、政治保卫公安科局。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50年、1951年时，新解放如云南、贵州、湖南、浙江、福建、江西诸省，县一级的公安局局长，须由中共省委任命。县公安局局长通常参加中共县委委员（解放初，县党委不设常委制）。公安工作是全党动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反革命活动猖獗，1950年10月10日，党中央毛主席发布彻底克服右倾思想，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神州大陆掀起镇反高潮。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分子、反动党团（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一贯道同善社九宫道等门派众多）头子，遭严厉打击。此后的中潮镇反，以及1955年因反胡风集团而引发在全国党政军群企深挖暗藏反革命，审查干部运动清理中内层，都是全党动手而并非公安部门单干。

在此应说明，从建国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二十七年间，国家安全工作是由中央公安部、省地市县的公安厅、处、局统管，而未单独分设国家安全部厅局。而省县的检察院、法院，其级别相同省的厅级、县的科局级；而并未升格如今日的副省级副市县级机关（以下，一般不再说明），当年刑侦警保诸技术手段及设备较简单，不及现在的精尖，破案依托“专门工作与发动群众相结合”，靠公安干警与老百姓的双眼。公安队伍以老解放区社会公安干部、军队敌工保卫干部以及蒋统区地下情特人员为骨干，选拔吸收拥护共产党历史清白的青年工人、学生和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形成了忠诚于党和革命，与广大群众血肉相连的公安干警队伍，是党锋锐的钢刀，受到社会大众的依赖与爱戴。

谁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飞来横祸，公安干警遭空前浩劫灾难。今据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及习近平同志2010年7月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的讲话，作介绍探索。

## 一、向首都公安砍头刀

自1956年中共“八大”后，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分管公检法司。彭真执掌北京市，主持全国人大议会，又参与领导国际共运世界革命，位高权大威重令行。1965年秋至1966年夏，毛主席和江青一直担心发生武装政变，防备颠覆，这见于主席多次谈话及批示。毛泽东特别欣赏林彪元帅1966年5月18日谈中外古今政变经，将这篇充满刀光剑影血溅宫门，杀人、杀人的讲话，誉为“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命全党全军学习领会，运用到一切行动中。毛江认定，北京是彭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公安局首任局长又是罗瑞卿，刘邓和彭罗陆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又粗又深。

主席在拿下彭罗，改组彭真刘仁原北京市委的同时，迅速整肃北京市公安局以防政变；毛从全国选调一千四百名军官，夺掌大权。军任职市局领导；师任职各区县局领导；团职营级到处科；连职干部分配派出所。将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邢相生、市委常委副市长冯基平（冯分管政法，原任公安局长。罗瑞卿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为罗手下的处长）多人镣铐入狱。曾选派中央公安部一位局长李钊接邢任局长，不久，又拘捕李钊。

江青、康生、谢富治泡制出一件《关于归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报告，诬陷冯基平邢相生等大批公安干部，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彭真罗瑞卿刘仁指挥下充当美蒋反革命地下军，似乎红都公安局是蛇蝎妖魔巢穴。为此，北京市公安干警1693人遭残酷打击迫害，72人关押成囚犯。

此文件迅即发全国，导致全国公安战线同志们又受狂飚劈雷劫难。在此前后，各省市自治区在公安队伍中大抓特务叛徒，抓历史和现行反革命，冤假案成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原任苏南公安局长（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随陈调上海，江青张春桥视黄为眼中钉，大上海有

2890名公安干警受难。黄赤波等78人被迫害死，96人致残。并逮捕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及其前任王芳（时为副省长）送北京囚狱。在辽宁沈阳市，军管会“破获”了以市委政法书记宋光和市公安局长李宏青为头领共76人的美帝苏修特务间谍网。又“查明”沈阳市旧公检法局（院）级干部十五人中，竟有叛、特、反、坏分子十二人；而处（庭）级干部六十七人中，叛、特、反、坏分子有二十四人。

好多省市都有被诬为阴谋投效美蒋苏修的公安干部。其实，涉国家安全情报特勤、隐蔽战线国内外工作，多有逆用敌方间谍特务及电台，布建秘密特情。本文不加举例多说。

## 二、罗谢李华四任公安部长

纵观二十世纪，由共产党执政，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为指南的欧亚国家，其特勤内务政治保卫干部最易遭难，残害最大，都不在对国际国内敌手的斗争，而在于党内高层宗派及路线斗争（路线斗争说白了是权力斗争）。因为它是党和国家专政机器要害部门，处党内斗争浪尖风口。只看苏俄，从契卡、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卢比扬卡的主人如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和阿巴库巴夫辈。他们按斯大林旨意，逮捕大批党政元老高干，元帅将军以及卡廷森林处死波兰俘虏，国际知名的文化艺术家、教授、流放北极圈西伯利亚，执行枪决以及卡廷森林杀波兰俘虏，毫不手软。而不久后，那伙签发逮捕劳改令，作刑场监斩官的权势人物，也变成囚犯也押赴该刑场处死。再层层揪黑线，追究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的亲信死党，关、杀、流放。一波又一波从莫斯科到加盟共和国、州、区大清洗；而又有大批人踏着前人的鲜血，飞升高官……

我党自开国到1976年10月惊雷，二十七年间共四位公安部部长。

首任罗瑞卿，早在1965年12月即遭批斗失去自由。罗不堪受辱跳楼自杀，未成，断了腿。在红都，罗被装入箩筐抬上台，同彭德怀元帅、彭真一起挨斗辱，通过传媒摄像，全球都看到了。罗夫人郝治平也自杀，被抢救，因为要留活口，怎可让郝随便死掉。此后，也就是为医治文革的伤腿，到西德动手术，逝于欧洲他乡。

二任是谢富治，解放战争时“陈（赓）谢（富治）大军”威名远扬。文革起，谢作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红遍天，1972年病故时，备极哀荣。

封建皇朝，死后追究有剖棺戮尸刑罚，现代文明世界早已废除。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中央永远开除谢富治党籍，谢的骨灰被驱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接谢富治的李震，非正常死亡。下文另详。

1973年5月，毛主席决定从地方选拔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1975年1月，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周恩来逝世，华代总理，1976年清明节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钦定华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兼公安部长未另外派人。当年10月，华任中共党、政府、军委三个首脑。

中共惯例，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职级者，退下后，其活动有时见于传媒。至少，最低，在某位老一辈革命家或国内外享誉的党外人士追悼新闻，在曾“慰病或送花圈者”名单上列入姓名。而华国锋免后从未见亮名；直到华逝世前。以致众多青年男女不知吾党吾军曾有个名叫华国锋的英明领袖。

四位公安部长，竟无一人年老“致仕”偕子携孙优游岁月享尽尊敬荣光，实良可浩叹也！

### 三、砸烂公检法和实施军管

江青于1966年11月、12月接见各地来京造反派时，多次诬指公检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是官僚机构，“要派军队接管”，江青狂呼“公安机关十七年干尽了坏事，要打倒、要砸烂！”瞬间，全国冲击公检法机关揪斗政法干部。

1967年，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后，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受到英雄般盛大欢迎。当天，谢富治指示李震、施义之等人称：“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谢强调：“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李、施通过公安部造反派小报《红旗》迅速传达到首都各式造反小报及外省市，再次掀起冲砸公检法的恶浪。1968年7月8日，毛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红卫兵五大领袖，谈到北京市公安干警中揪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达九百多人时说：“提出‘砸烂公检法’，我说，好！”。

党的刀把子，却如此疑忌不信任，而要派人民解放军接管夺权。1966年、1967年，从军队选调兵团级一人，军级三人（内从空军×军副军长到公安部的赵××，1971年九·一三后被拘捕审查），师级十人、团级二十人，进公安部大“掺沙子”，军级干部为部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7年12月9日，中央又发（67）379号文件，再次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凡未实行军管的应一律实行军事管制。这使本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公检法，反被自己的党专了政，原先的政法干部大批下放劳动审查。各省、地市县公检法，也大多由军队支左干部当第一把手。关于文革中实行军管，我至今仍不明白？我也曾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作过军代表，那是新解放区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已解放十七年了，却要设立××市××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甚至一个市县的百货公司、人民医院也要派军管小组军代表夺掌权力。

接掌公检法的支左军队干部，不熟悉地方社会阶级关系，也不大了解历史。他们无限忠于伟大统帅和林彪副统帅，其中不少人对毛主席器重信赖的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辈狂热崇拜极端拥护，对江、康一套很合口味，加厉奉行。以后，军干群成立省市县革命委员会，建制公检法合一的人民保卫组，人保组将公安的侦缉、防保、预审；检察院的核查、批捕、起诉和法院的庭审、判决……由一手包办。公检法相互监督、制约不存在。更使原有为保障民主法治和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制架构毁灭；尽管，它还只是初步。滋生出无数冤假错案，导致成千上万党员骨干无辜百姓死难伤残。

宪法成废纸，人权、法制与民主荡然。砸烂公检法再加上号召“群众专政”、“造反派说了算”，一度各地随意抓捕乱杀成风，湖南省的零陵专区，在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就屠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子女，共杀死和被迫自杀达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尚未成年者862人。还有四类分子及子女受毒刑致伤残2146人。手段极端残忍，人性泯尽，连观世音大士和主耶稣基督也无踪影。近万冤鬼悲啼，老百姓不敢夜行，新中国人间竟有此恐怖岁月！

早在文革开展初，1967年1月13日，中央颁布“公安六条”，内突出制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处”。该条运作时又无限扩大到凡对文革做法，对江青、康生、张春桥的言行有怀疑批评，都定为“恶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弥天大逆从重惩罚。如中外皆知的遇罗克、林昭、张志新、李九莲，其实只是个例。仅辽宁省以“恶攻”处死并割喉者，就有三十余人。在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运动中，被活活打死，弄死和自杀，惨刑致残，在舜尧神州到处可见，

天怒人怨。

#### 四、副部长横遭诬陷监禁

我文所说的是指1966年春在岗的中央公安部副部长；此前曾任过公安部副部长如陈龙、汪东兴、王昭……不涉。1966年以前，能官拜中央公安部副部长者，都是出生入死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在人妖颠倒的岁月，竟被认作阶级敌人，囚禁监审。

文革伊始，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即成囚犯，残酷迫害死。

汪金祥是锄奸剿匪反特社会部老资格，从东北大区调中央公安部副部长，被诬在东北在北京和苏联顾问关系不正常，毛主席访苏途径东北汪通过逆用电台报告台蒋，与高岗阴谋勾结……。林彪、江青、康生都插手汪金祥案，中央成立专案组，将汪作奸逆特嫌拘捕彻查。

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同副部长职级）尹肇之隔离审查。

1968年初，指副部长凌云伙同徐子荣布置反革命分子王×（系公安部的局长）几人“对我们伟大领袖最好的学生江青同志进行秘密侦察……对江青同志进行恶毒攻击……等。

中央决定捕了凌云。

1968年3月，中央抓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声讨“杨余傅”万人大会，林彪、周恩来讲，毛主席出席。会后，中央拘捕了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严佑民。杨在毛泽东访苏联、周恩来陈毅访亚非几国，都随行负保卫重任。严兼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都变成党的囚徒。

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在李震死后五天为中央监押，见下文李震之死。

上文，共述及徐汪尹凌杨严于刘，八位副部长。至于公安部内正副司局长四十九人，内除六人外，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或现行反革命、死不悔改走资派竟达四十三人，不及赘述。

#### 五、李震部长非正常死亡

李震原任沈阳大军区副政委（司令员陈锡联），1966年秋调中央公安部，接替徐子荣任常务副部长。1970年，谢富治查出患癌病，由李代理部长。1972年，谢富治病亡，中央正式任命李震为部长，李也是中共“九大”、“十大”中共委员。李震为人正派、虚心，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

中央公安部自开国起至文革结束四任部长，罗瑞卿、谢富治一言九鼎，罗谢说的，局长副部长没一人敢持不同意见。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提拔从地方到中央，华的话在公安部是最后决定。只李震，有时副部长间不同争论，李表态，不听。在关外，李熟悉军队，且上有司令员、政委，轻松自如。而地方党政复杂，文革在首都充满诡秘莫测拜占庭式宫廷政治；而公安部又处漩涡激流中心。李震常感压力沉重。

李震于1973年10月20日星期六夜接一电话后外出，未归。22日星期一，到处寻找，终于在公安部地下室小道内发现了李震的遗体；当即报告中央和周总理。当时，中央研判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因李震一向在军队，政治上党中央高度信任大力支持，个人家庭妻孩美



满，没有任何自寻短见道理！？为此，决定成立破案领导小组，由华国锋主持，成员有：

杨德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8341部队政委）  
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  
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郭玉峰（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  
于桑、施义之、祝家耀、杨贵、徐海涛（此五人均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刘湘屏（中央卫生部长；已故谢富治的夫人）  
罗青长（周总理高级助理）

在听取李震案的汇报时，毛主席讲了明朝皇宫内发生过：万历末年，有个莽汉持棍闯入慈庆宫，欲槌击皇太子，其口供涉及郑贵妃两近侍太监；泰昌帝沉迷女色服春药致病，有献“仙方”红丸，吞服后当夜毙命；还有曾为先帝侍寝的美人，占住乾清宫不肯迁移。毛主席谈槌击、红丸、移宫三大案说，为什么要杀人呢？！应调查研究。

10月26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全体与会，当进入大会堂到会议厅前，迎候于此的杨德中亲自指挥8341部队战士，将于桑、刘复之挟走。此会到场有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诸首长，还有杨德中、吴忠、郭玉峰几人。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全国人大前，我们应当想得深一点，想得远一些。”会上提到，公安部部长被害，建国以来从未有过，比云南谭甫仁案还严重（德传按：谭甫仁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和其夫人某夜在警卫森严的大军区首长宿舍被枪杀，当时全国小道传闻满天飞），会议认为，李震被害和当前国内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相关。中央公安党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已发展到要杀人夺权的地步……。

会后，在部内发动大清查，各人自报公查，10月20日夜至22日晨在何处？做什么事？何人证明？将李震的秘书郑XX、于桑秘书戴XX、刘复之秘书莫XX、李震办公室勤务徐XX等隔离审查。并牵涉及上述人员在北京和外地的亲友。怀疑李震“遭害”可能为于、刘支持。

公安部内肃杀紧张之势延持到1974年初，肯定李震死亡与于桑无关，于桑自北京卫戍区放回家，不久恢复部领导工作。随之，破案领导小组作了确认李震部长系自杀的结论；涉嫌被监护人员一律解除审查，但是，在部内及部外已伤害了许多人。1974年冬，卫戍区吴忠司令员提出，华国锋批准，刘复之也获解脱，出卫戍区。

## 六、四人帮安插死党进公安部

江青集团早就密谋夺取党的刀把子，无奈毛主席调动军队干部掌权，只好窥测方向待机。中央“十大”四人帮权位飞升，王洪文、张春桥遂选派死党祝家耀、徐海涛入公安部领导岗位。祝家耀是同王洪文、王秀珍一伙在上海造反起家的“铁哥儿”，“十大”中央委员。徐海涛很早从上海警备区杀出支持向上海市委造反夺权，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和王张混熟。同时，纪登奎也安插杨贵到公安部任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杨贵本是以太行山引水红旗渠出名的中共林县县委书记，文革最早杀出造反，上升河南省革委会，是“十大”党中央后补委员。正好有工、农、兵改造旧公安部！四人帮内定，祝家耀接李震任公安部部长。阴谋自上海调大批心腹任公安局局长处长。王洪文、张春桥在党中央并不分管公安政法的，由此能及时熟悉公安部及全国公安动向，又常召祝家耀去当面密谋。不久，张春桥又将徐海涛调出公安部，回总政治部任保卫部

部长。

当祝家耀进公安部，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起家新贵欢腾鼓舞，从上海调干部入公安部，不论刑侦、治安、边防、劳改、海外情报、国际工作，都好当局长。可惜啊！中央任命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从上海，选调一批心腹控制中央政法的企图未及落实泡了汤。十月惊雷，祝家耀落网成阶下囚。

## 七、公安支左施义之、刘传新两将军

我曾见过刘传新，就先介绍刘。那是六十二年前的1949年。我随主力XX师进兵与国民党军对阵前线。刘传新是该师X步兵团政治委员，听师部及该团连营干部，都赞誉刘政委能文能武。抗战初由永城抗日游击队升编入主力3团任7连指导员，继任彭雪枫部骑兵团骑兵团政治委员。刘时常在连队及班排，关心战士，威信很高。1958年时，刘任上海警备十一师师政委、上警政治部副主任；再调X军。

毛主席选调1400名军队干部接控北京市公安局、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北京市局主要负责人。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研讨时，许世友司令员说：“叫刘传新去！”一句定音。刘时任X军军副政治委员。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专长攻坚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也就是1989年6月政治风波时的“北京戒严部队”，今XX大军区XX集团军。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刘传新上北京，在李雪峰、谢富治、吴德三任市委第一书记领导下主持全市公安政法，从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起，到官封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统管红都强力部门，言出法随，名驰幽燕。

文革送终后，全国大清查大揭发大批判时，重机枪榴弹炮轰向刘传新。据知，主要三方面：

文革十年间，红色首都一度妖魔横行成恐怖世界。造反派大量私设公堂和监牢，任意抓、关、刑，实施法西斯专政；加上市公安局的囚狱。众多革命功臣、国内外知名的知识分子统战人士，受毒刑逼供伤残惨死家破人亡。只举孙炳文家。孙是和朱德一起赴欧洲寻求救国救民之策，1922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孙炳文于四·一二政变遭杀害，朱德闻此讯当场昏厥。其子孙泱（孙宁世）从日本到延安任朱德的秘书，朱老总视为亲生儿子。文革起，江青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点名孙泱（时为人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是大特务，是人大全体革命师生的公敌死敌。孙泱被关押在人大私设牢狱毒刑，于1967年10月6日被害死，中央文革下令不留骨灰。一代风流红都丽人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之女，周恩来邓颖超的干女儿。曾留学苏俄七年，林彪、刘亚楼都追求过她。江青和康生以“苏俄特嫌”和“恶攻毛主席”命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在囚狱内备受凌辱肉刑，于1968年10月9日惨死于牢中，骨灰丢弃。朱总司令、周总理邓大姐，无力也不敢救护此二位烈士后代的生命，连保存骨灰也做不到。成群的受害者和家属当然要求申雪平反，并追查刘传新与江青的关系。

二是，在北京公检法司大批干警涌起清算批斗刘传新。

最最要命的“催魂无常”是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派人混入广场民众中，暗地拍照、录音；侦明姓名来自何省何单位；第一个给周总理送花圈者就是北京市局侦缉捕获。“四五”后，又群众性追查“传抄反动诗词，周总理遗言”、“造谣”，北京公安局的材料转去省县，涉及县、公社，全国骚动。许多人职级党籍处分，有的仍关押班房，株连亲

属，当然要求翻案。该找谁算账呢！？

清明时，华国锋坐镇指挥，华也是四五事件政治上最大受益者。天安门镇压后，毛泽东任华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共历史上从无先例）、国务院总理；而后，才有“你办事，我放心”……粉碎四人帮后，华头上封“英明领袖”光环，正大造个人迷信，著名女歌唱家郭兰英山西曲调颂华的歌（类似“东方红”颂歌）正在电台教唱。形象酷肖毛泽东的华国锋象正在全国机关工厂家庭挂起（现在，有兄弟党为接班人造神，学去了此妙法）。你贴大字报责斥华国锋，有绑赴刑场的危险。

第三，应该找吴德算账。就是吴德4月5日广播讲话宣告天安门有坏人，有反革命破坏活动。但，吴德正红。首都大型集会多由吴德主持。

雷公打豆腐，拣软的。于是，首都闹市“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大字报，漫画一度成海洋。1977年5月8日，刘传新将军自己结束了人生，去见马克思，去见毛泽东。

文革蓬勃开展，中央要北京军区选送一名军职干部到中央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职级同公安部副部长），军区党委决定调第X军军政治委员施义之去。施义之文化较高，从排长、宣传员干起，在旅（军分区）、纵队任过多年锄奸敌工科长。1947年任X纵队的团政委。施义之到公安部十年多，副从谢富治、李震、华国锋三任部长，一直是部领导成员。在李震自杀后，华国锋任部长前的跨三年十六个月，由施义之主持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这还是由周恩来会上当众宣布的。文革以后，施义之政委遭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发生活费的处理。

综观施、刘两将军的历史，本是党和人民军队的优秀干部。到公安支左如此结局，显然其个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不展开；但，最主要还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反革命’”所害。几位曾是刘传新上级、同级或下级的老兵，尤其是刘任步兵兵团政委时的团长（后为军长、大军区副司令员）3营营长（后为副军长兼军参谋长）几次当面告我，“刘传新如不去北京公安支左，在部队抓训练，抓战备必大有贡献，不太久去副扶正，任军政委或省军区政委。再升职作大军区或者军委兵种如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的副政委，还是相当强的……何以落得如此下场……”言及不胜唏嘘。

如上所述文革祸延公安部，公检法司受浩劫，那末是否真正砸烂难以翻身呢？否！否！

政法战线除那伙唯恐天下不乱自封造反左派四人帮小爪牙外，还有不少同志（他们头上似无辫子可抓）坚守岗位，尽可能维持法制法治。而横遭诬为叛特反的公安部部长（最高检法长）局庭长、省市厅（院）、处（庭）干部，并非小绵羊、阿木林。他们历经锻炼考验，苏区肃反、抓AB团、延安整风审干、肃托、三及、反胡风清理中内层……什么没见过，他们能尽力保护自己及战友，视四人帮爪牙如乌龟王八小爬虫。除了被弄死（死者无法复生），于1972年—1973年、1975年及文革结束后，陆续得“解放”重返革命岗位。

如刘复之，文革后任中央司法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1983年全国开展“严打”，就是邓小平召见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的谈话指示后，在全国城乡雷厉风行实施。

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文革以后，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大上海政法亦由严主管。拨乱反正，建设民主法治成效显著。

文革后，组建成立国务院国家安全部，凌云为首任部长。

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及其前任王芳自杭州捕囚北京，四人帮尚在时从狱中释出。后，吕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王任地委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吕剑光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王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任过浙江省委书记，调升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武装警察第一政委、武装警察党委第一书记。

本文作者：毛德传（离职休养老干部）

□ 原载《领导者》总第41期

~~~~~  
【人物追踪】

揭秘1977年为“四人帮”自杀的北京市公安局长

• 蔡明忠 •

1966年5月，随着对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一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

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派军代表接管各处、分（县）局及基层科、队、所。

1967年3月24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紧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3374件，并将其中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CC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39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

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300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105人，其中91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3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康生、谢富治等阴谋家对刘传新提供的材料如获至宝。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批示：“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谢富治则煽动说：“公安机关如果不彻底改变，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

1968年8月17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8000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24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8月23日，刘传新将814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8月29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70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1080人，还有459人待定案处理。”

风雨飘摇。北京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根基在一阵阵腥风血雨中抖动、摇晃……

毛泽东主席有所察觉。

周恩来总理忧心如焚。

早在1967年12月，毛主席对刘传新上报的诬陷材料就提出过质疑：“10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1000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斥责谢富治、刘传新的行动“是剜心战术”。

然而，刘传新自恃有后台为他撑腰，极力想维护他在公安局夺权后所窃取的统治地位，他不仅对毛主席的告诫置若罔闻，而且对周恩来的指示极为反感。在市公安局传达、贯彻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时，刘传新继续坚持说前17年的公安工作执行的是一条“又粗、又黑、又深、又长的黑线”，“有人想借一分为二恢复老一套”。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1000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他有幸作为亲信提前从“四人帮”那里领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旨意，所以他的“批邓”口号也比社会上早喊出了两个多月。还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传新便在市委常委会上以《“多纲论”的反动实质》为题发言，指名道姓地攻击邓小平“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又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使亿万中国人民悲痛欲绝。但是，与人民为敌的“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为了压制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竟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还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他们便别有用心地炮制出了阴阳怪气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强奸民意，蹂躏党心。紧接着，又公开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直指刚刚着手拨乱反正、整顿国民经济的邓小平同志。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4月4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当一辆警车开过来，几名警察冲向那个正在朗诵《请收下》的青年时，他们一边不无揶揄地叫喊：“收下吧，收下吧，把你也收下！”一边疯狂地揪下那个青年，把他扔进警车里。紧接着，200辆卡车开进广场，2000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第二天凌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各处的干部和群众紧急集合，接受处领导传达市局的命令：根据上级指示，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经结束。昨天夜间，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已全部搬走。大家现在到广场去的任务，是劝阻群众不要再送花圈，不要再搞悼念活动，各自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人们没有被吓退。9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28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5万人，警察3千人、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28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8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200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583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6.6万多份，照片10.8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600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15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600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1976年10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1977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5月18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1977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

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 摘自《湖南文史》2004年第0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